

#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回應與對話<sup>\*</sup>

黃崇憲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吳介民著，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年4月，464頁。

## 一、個案研究專書寫作之傑出範例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具有三點重要意義。首先，在當前學界普遍以學術期刊論文出版為主，紮實統整性的專書寫作相對顯得稀少十分難得可貴。究其實，回顧古典社會學傳統，專書寫作向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只是過去二三十年來台灣高教評鑑制度，由於專書寫作不利升等，才出現偏枯的現象，本書的出版提振了專書寫作的知識生產模式。再者，過去數十年來與台灣未來政經發展與命運密切相關的「中國崛起」現象，在台灣學界反而少有較宏觀又深入的專書出版，就本人的眼界所及，此書也許是首發先鋒。最後，就學術研究而言，本書可視為個案研究專書寫作之傑出範例，本文也以此視角對此書進行評述。

---

台灣社會學第38期（2019年12月），頁183-194。DOI: 10.6676/TS.201912\_(38).07

<sup>\*</sup> 本文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舉辦的《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新書討論會（2019年5月17日）之與談內容整理而成，為了保留公共與談的對話氛圍，不循一般學界書評之書寫格式，除了刪除口語化的冗言贅詞外，也略增當時囿於發言時間所限之延伸討論。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當日會議錄音檔，特誌之。

## 二、「中國發展模式」的個案置疑化： 例外主義或獨特性？

Robert K. Merton (1987) 曾從他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將總結的心得歸納成三點：確立現象 (establish the phenomenon)、標示指認未知 (specified ignorance)、選取策略研究材料 (strategic research materials)。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確立現象」和理論化過去三四十年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模式，「何以致之」和「孰以致之」此大哉問，並以此作為全書之制高點提問。就專題研究而言，本書是非常成功的策略性個案選擇。個案研究並非是現成不言自明的，乃是研究者投入大量時間心力，精心打造出的研究構框之「個案化」，如何形成謎題 (puzzle in) 和解謎 (puzzle out) 是一個充滿試誤也是一個不斷逼近、對焦、再界定的過程。

一個傑出研究首要之務，即在於標定知識謎團，也就是 Merton 所說的「標示指認未知」，此未知是透過對研究現象反覆梳理探勘「現象自身」及既有相關文獻之後「努力學來的無知」(well-learned ignorance)。此「無知」像黑盒子般待解密，通常以「研究問題」之方式揭示。但提問之高下深淺、曲徑通幽之奧妙，卻才是吃緊處。大多數的提問可能是在 Thomas S. Kuhn (1962) 所謂「常態科學」中枝微末節的微調，更上者是發現知識斷層，最難的則是發現與常識斷裂，反直覺的謎題，從而挑戰了傳統的常見。例如，Adam Przeworski (1986) 提出「是工會組織工人，而非工人組織工會」，整個翻轉顛覆學界對工人運動型構過程的習見。同樣的，Michael Burawoy (1979) 反詰傳統馬克思勞動異化觀點，提問「為何工人如此賣力工作？」導出「志願性順服」的重要理論宣稱，而掀開勞動過程研究之新頁。然畢竟泛泛之問多，深刻拋光打磨的「謎團」尋尋覓覓難矣哉！

吳介民本書的知識謎題，定錨在對傳統政治經濟學中尋租理論之挑戰，探討中國的轉型經濟進程中，為何地方官商的尋租行為並沒有導致經濟停滯，反而與經濟成長並存？從比較廣角度的觀點來看，本書整個問題意識企求勾劃，而且不只是勾勒，還要更進而理論化「中國發展模式」之具體內容，究竟意味著什麼？本書以一個特定社會發展之歷史個案，來探討理論界的重要議題，是非常精采的策略性個案研究之選擇。不禁讓我想到 20 世紀幾本很重要的書，比如說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96) 藉由檢視美國的勞工政治，詰問為何社會主義在美國如此孱弱，而導出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Robert Bellah et al. (1985) 研究明治維新時期之日本文化信仰系統，來回答為何日本在其他亞洲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成長特別迅速，而宣稱「日本獨一無二性」(Japanese uniqueness)。

因為這兩個個案，一方面有例外主義，另一方面又有獨一無二性，都藉由個案提出了突出的理論意涵，因而形成很精彩的策略性個案研究的謎題。雖然我知道作者對中國研究的選擇，並不全然是出於學術上的考量，而是來自他對台灣長期身處在三大帝國（中國、日本、美國）邊緣夾縫中，如何折衝自保的險峻地緣政治（特別是中國「天朝主義」對台的武力威脅）之未來出路的求索。在此關懷驅動下，為了深入了解中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即實地踏上中國做田野的台灣學者。此書正是他二十年磨一劍之作。

如果說過去「美國例外主義」和「日本獨一無二性」之命題，曾經引起學界很大的討論迴響，那自成一類的「中國發展模式」也是非常值得學界重視的關鍵議題。作者在書中第 22 頁中這樣說：「中國在東亞與世界經濟中具有特殊性，雖然自成一類 (*sui generis*)，但其規模與影響力，使得這一個特殊類別超乎一般國家的顯著性與理論重要性。分析中國的尋租發展型國家，有助我們回顧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命題，並作出歷史比較。」此即是上述所說的非常有策略性理論槓桿支點的個案選擇。

然而，一個很令人頭痛的問題，就是到底要如何去界定和理論化「中國發展模式」。如果從歷史比較角度看，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絕不是中國官方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宣稱其實就是史賓格勒意義下的「偽形結構」之政治話術）是一個現代史上非典型的資本主義，是個異類，完全不是按照邏輯生產出來的一個非常矛盾的綜合體。雜揉了在此之前，沒有被任何一個共產黨執政的政治經濟體系所綜合的非典型制度配置，把很多以前在學界普遍被人認為相互矛盾的，甚至根本衝突的種種制度要素，搭配在一個大制度的框架之中，但因為中國的經濟量體太大，所以對很多深刻矛盾的容受力特別強。而且還產生相當引人注目的成果，這也是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否認的。

### 三、個案自身之實質內容 VS. 個案反身性之理論意涵

（Learn *ABOUT* the Case Vs. Learn *FROM* the Case）

到底要如何界定「中國發展模式」，迄今為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大部分都停留在「標籤化」或是「命名」的層次，缺少解析性的力道。比如說：列寧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新威權主義、權貴／特權資本主義等（族繁不及備載），可說眾聲喧嘩，的確對學界提出莫大的挑戰。鑑於此，作者提出的「尋租發展型國家」作為「中國發展模式」的定性分析，頗具洞見。

個案是被「造」出來的，需有見縫插針般的縝密知識構框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判準，就是能與既存理論切磋、質詰、或更甚而對原有理論構成挑戰，並加以修正或重建。此外，個案研究之知識任務有兩個判準：（1）「個案自身之實質內容」，力求個案的經驗現象豐富性，特別是尚未被知識雷達偵測定位到的；（2）「個案反身性之理論意涵」，就是此個案研究之理論意涵，在研究發現的基礎上，拉高

抽象層次，進行理論探討。在此層次，因知識社群共享社會科學的一些基本關鍵核心議題，因而打開對話空間。同時也是將個案擺在既有的知識地圖中，突顯其理論槓桿的支點作用力。

## 四、「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論化

為了精準定位「中國發展模式」，作者調度了三四組理論（全球價值鏈、發展型國家、公民身份、尋租理論），將其構連成有機組合的理論框架（而非疊床架屋之混搭拼裝）。而且不只是套用理論，還加以適度微調和重新校正，甚至去挑戰原有理論，提出他的理論宣稱。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並解釋在中國猖狂普遍的尋租行為，為何能和經濟發展，兩者間表面上看似悖反的現象，卻能共生並存。《尋租中國》一書所指的「機構化尋租」，乃是由地方政府和官員整個機構，以組織化的方式和資本（包括內外資）合作，企業用金錢交換政府的政策作為「保護」。例如用人頭稅、管理費，換得相對穩定的經營，但也導致「黑手黨政府」行為模式：沒有法治保障產權的一個「制度後果」。作者提出的歸因理論是因果機制的解釋模型，並試著整合宏觀—中距—微觀多層次的連結機制，以及彼此間的宰制支配或者回應互動關係，但並不是線性式的，之中有很複雜累進疊加之論證結構，在此無法詳述。

全書的主要架構可濃縮為四大塊連接介面，容我引述作者開始報告時的 PPT 如下：（1）台商連結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商協助將全球價值鏈引進中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2）尋租與成長存在的現象：尋租發展型國家，對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回饋；（3）國家在制度化剝削中的角色：公民身分差序，建構在沿海工業地帶的「新城鄉二元體制」；（4）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國家作為全球價值鏈中的價值攫取者，國家作為與全球資本霸權體制的競爭者（爭霸者）。

綜合言之，以歷史制度論的思路，穿梭出入於宏觀—中距—微觀等不同層次，加以整合，並指出尋租與經濟發展看似悖論的共構正向關係。本書的主軸敘事如下：從 GCC/GVC（全球商品鏈／全球價值鏈）的角度考察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台商作為「中間人」，迂迴促成「中國崛起」，以勞力密集工業化，賺取外匯，促進國家累積財政能力。為了探求中國式資本積累體制特有的剝削邏輯，作者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理論，指出民工面臨「雙重剝削」的處境，一方面是典型的來自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形式（傳統意義下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對民工身分的界定，圍繞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建構二元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等差化社會保險方案，使民工面臨另一重剝削，讓企業「合法地」採取次等公民的勞動待遇雇用民工。民工位處勞動體制的最底層，成為經濟剩餘的主要創造者。公民差序格局理論的提出，也是本書非常突出的原創性亮點。受限於本人極有限的中國識讀能力，不克進行實質的深入評論，僅能以「普通讀者」提出幾點回應，與作者切磋。

### 對話與回應一：尋租 vs. 軟預算

首先，本書緊扣著核心謎團展開，以叩問為何猖獗的官僚尋租活動能與快速經濟成長並存的現象形成謎題。而解謎則以地方政府官員如何以組織化、集體化的尋租活動，獲得在中國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經濟剩餘，解釋尋租與經濟成長並存的現象。雖然經濟學家早已指出，人類經濟世界中，充斥著無所不在的尋租行為，但卻缺乏一個統合理論架構。作者在此書中對既有文獻中尚未被充分了解的「尋租行為」，有非常精到的細膩闡發。若比照 János Kornai（1992）「軟預算約束」（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概念，作者也許可進一步發展成「最適尋租約束」（the optimal rent-seeking constraint）。軟預算約束此概念之提出，最初集中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弊病，即當他們發生長期虧損時政府會追加投資、增加貸款、減少稅收，並提出財政補貼，使其免於破產。由於不會破產，使得國有企業無法解

決各級管理人員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因而效率低下。相對而言，《尋租中國》一書中，猖獗的尋租行為，因為受到全球價值鏈與廠商必須有利可圖的雙重制約下，不至流於掠奪性的極大化，而只能是最適化。全球價值鏈扮演制約政府財政掠奪的一個重要「安全閥」之把關者，因而是「最適尋租約束」。

### 對話與回應二：一塊重要但卻缺而不見的拼圖：地方政府

從發展型國家的觀點來看，所講的國家指的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往往都是看不見、散失、行蹤不明的，然而在中國地方政府卻扮演很重要角色。在中央政府「分權讓利」的制度設計下，地方政府都是一個小的諸侯經濟，有相當的斡旋審度裁量空間，都不是台灣，也不是日本、韓國有的。地方政府官員就是鑲嵌制度治理中的重要行動者，「分權讓利」是非常高明的制度設計，因為提供了地方政府強而有力的誘因結構，去驅導與擴大，經濟動員的覆蓋面與勢頭。也許可挪用 Ronald S. Burt (1992) 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 之概念，將地方政府視為重要不可或缺的，橋接媒合行動者與關鍵節點，或可姑且稱之為「制度洞」(institutional hole)，作用舉足輕重，補足了一個很重要的中介行動者，讓地方政府可以扮演積極招商的角色。

### 對話與回應三：「國家能力」之重新概念化延伸

從國家理論的系譜學考察，Theda Skocpol (1979) 將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界定為制定與執行政策的能力。Michael Mann (1987) 則將其分為獨斷專制權力 (despotic power) 和基礎行政權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在《尋租中國》中作者使用了「國家性」此語詞，是分析當代國家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入點，國家的性質 (stateness) 必須再重新概念化延伸其面向。鑑於此，《尋租中國》書中所提及的國家能力，或許可考慮再擴充聚焦在三個面向上。

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能力，就是打造正當性之霸權論述 (legitimacy

意識形態機器能力	建構正當性之霸權論述
財政萃取能力	價值之獲取
監控能力	社會控制

building）。任何政權都面臨正當性問題，即其政治秩序是否或為什麼應該獲得被統治者接受。Louis Althusser（2014）曾主張「國家意識形態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i），藉由家庭、學校、媒體和工會以呼喚主體的方式（interpellation of the subject），將被統治者臣屬化。國家也會透過軍隊與警察等「壓制性的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i），使用暴力和武力來鞏固統治，並進而以這種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方式，來達成意識型態的嚴密控制。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體以打造「社會主義人」之意識形態來徹底改造社會，鄧小平 1978 年南巡推動改革開放，要由社會主義轉軌時，則提出「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老鼠的都是好貓」等俗諺，來合理化經濟轉型。1989 年「天安門事件」此政治大參數，要如何重新建立人民解放軍跟人民、國家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成為當時政權最棘手的嚴峻挑戰，迄今其幽靈也還揮之不去。習近平上台之後，所提出的「中國夢」，以反西方及民族主義為槓桿，撐起最新一波意識形態旗幟，企圖處理從極權政體轉型成威權政體的正當性困境，正當性流失的慢性危機隱然浮現。

再者，財政萃取能力就是從經濟發展中，對剩餘價值的獲取，也就是財政稅收，Joseph A. Schumpeter（1962）稱它為「賦稅國家」（tax state）或「徵稅國家」（tax-collecting state），也回應了 16 世紀法國政治理論家 Jean Bodin（1992）所說的：「財政工具是國家的神經」。在《路易霧月十八》一書中馬克思這樣寫到：「財稅是官僚體系、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命源泉，簡言之，也就是整個行政權力機器的生命源泉，強國家和重賦稅可視為同一。」（Marx 2003）或如 Edmund Burke（1982）說得更直接：「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是國家本身」，是國家運作的物質基礎。中國財政總稅入在 1995 年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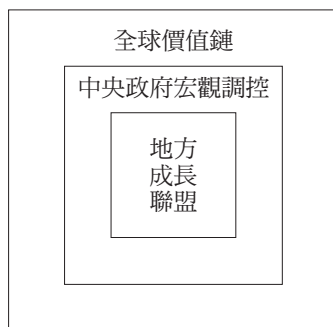
同年度的 GDP 10.7%，2018 年佔 20.3%，翻了一倍（國家統計局編 2019）。中國政府過去二三十年從國民經濟中汲取的份額持續高速成長，因此從 2008 年因應全球金融風暴，在經濟發展經歷了 30 餘年的快速增長，又剛好處於結構上的走緩下滑階段，可以由政府巨量投資基礎建設，透過政府干預資源配置，以各種形式的預算補貼、低成本的信貸融資來支持大型國有企業、在戰略性產業中的發展，而獲得 GDP 的粗放式成長，但卻犧牲效率來達到軟著陸。中國政府有這個宏觀調控選項，此政策工具並不是多數發展型國家有的。

還有監控能力，中國大概是全世界在維穩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國家，迄今維持著全世界最嚴苛的網路監控，以最可怕的維穩方式來控制全世界最龐大的社會體系。具有中國社會特色的控制系統之發展所達到的精緻、細膩、靈活、堅韌、多層次、多面向、多力度，全世界再也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望其項背，而且此系統持續地現代化成「數位化監控體制」，或可稱為「社會控制工程學」（social control engineering）。維穩壓倒一切，是考慮未來中國在經濟轉型中很重要的參數。

#### 對話與回應四：套嵌出口主義（nested exportism）之宏觀挑戰與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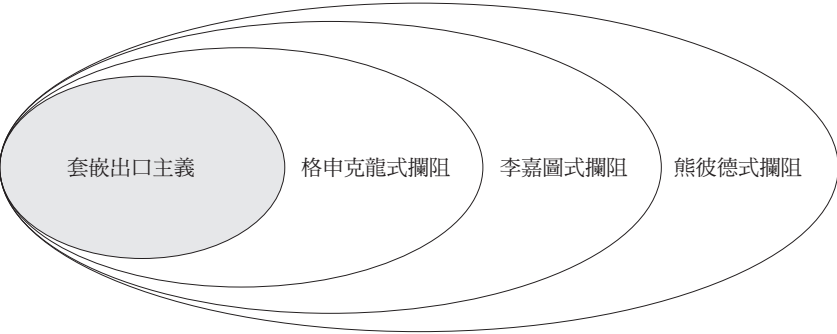
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發展模式是「套嵌出口主義」。作者在書中著墨甚多的，在內層的地方成長聯盟會成為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函數，而此制度配置又受到全球價值鏈的制約。隨著歷史條件與全球價值鏈的移動，其制度均衡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最近中美貿易戰的開打，所承受的結構性壓力，未來對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挑戰。示意如右圖：

最後，所有後進追趕之發展型國家，歸納來說，不免橫亙著幾道需要跨越的攔阻。第一個是格申克龍式攔



阻（Gerschenkronian hurdle），就是在資本匱乏的初始發展階段，國家必須扮演資本形成的要角，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用的是引進外資。另外一個是李嘉圖式攔阻（Recardian hurdle），指的是靜態的相對利益。簡言之，就是所謂的「中國價格」。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低成本的人權優勢、環境管制寬鬆，還有為中國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的龐大農民工。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由政治威權、社會控制、管制的市場經濟等三根支柱所構成，但此模式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社會弱勢被相對剝奪、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體制內嚴重的官僚貪腐、公共政策不透明的決策僵化等等。昔日所賴以發展的相對利益之條件也耗盡了。最後熊彼德式攔阻（Schumpeterian hurdle），就是如何以技術追趕和創新，來達到產業升級之嚴峻挑戰，簡述如下圖表：

格申克龍式攔阻 （Gerschenkronian Hurdle）	國家作為資本形成之主要行動者
李嘉圖式攔阻 （Recardian Hurdle）	靜態比較利益；相對價格優勢 （所謂的「中國價格」）
熊彼德式攔阻 （Schumpeterian Hurdle）	技術追趕 產業升級；創新驅動



中國自「天安門事件」後三十年的政治穩定，有很大程度拜經濟高成長所致，如今由於「總要素生產力」（經濟結構性與制度性的問題）的貢獻度下滑，經濟成長趨緩，顯現了中國原有經濟成長模式的極限，此穩定能否繼續維持是很大的問號。作者自述其學術志業

之主要目的，在於對中國能有清澈的識讀能力，而且不只是從台灣來看兩岸關係，而是從宏觀的整體世界局勢之動態發展來思考台灣的未來。作者身體力行從事不少「社會學式的公共書寫」，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介入當代「台灣何去何從」之思想震央。然而，在《尋租中國》一書中，作者充分展現了學術工作者該有的自我克制與專業倫理，清醒地拿捏分際，出入於 Burawoy 所謂的「專業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之間，殊屬不易。

## 參考文獻

- 國家統計局編，2019，《中國統計年鑑-201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Althusser, Louis. 2014.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Verso.
- Bellah, Robert N., William M. Sullivan, Richard Madse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din, Jean. 1992. *On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ke, Edmund. 1982.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 Mann, Michael. 1987.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2003.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Merton, Robert K. 1987. "Three Fragments from a Sociologist's Notebooks: Establishing the Phenomenon, Specified Ignorance, and Strategic Research Material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1-28.

Przeworski, Adam. 1986.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A. 196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